

寻找童年

叶龙虎



春节的头几天，阳光明媚，有人穿衬衣都嫌热，竟卷起了衣袖。我心血来潮，走到岭缺推折向北，漫无目标地走着，一边想象着这一带曾经的模样。

原本的碎石路是不见了，成了狭狭的田埂，边上种着青菜、蚕豆、豌豆之类，豌豆吐出嫩绿的细须，缠绕着插在旁边的小竹竿。要不是那座大坟还在，我是无法辨认眼前这条走过无数次的古道的。过去，唐李张、上王、叶家湾等山里人，凡要到二六市赶市，这条古道是必定要走的。到了岭缺，他们才选择要么穿过曹家弄上街，要么沿着鸡鸣岭从湖桥庵的小河边走。山里人三二结队，肩担杂挂，边走边说话，远远就能听见他们的大嗓门。他们的竹笋、杨梅、吊红、柿子是二六市街上的主要山货。

所谓“岭缺”，是鸡鸣岭的一个缺口，它与南北走向的谢家岭古道相交。向东过湖桥庵是去慈溪“城里头”的“官路”；向南穿过曹家弄是二六市老街；向西翻越鸡鸣岭是“官桥”，抗战胜利后，官桥村一度升格为官桥乡，二六市还受它管辖；向北则是谢家岭古道，进山与相吞至杜湖东岸的九曲岭相接，直通山北鸣鹤古镇。

岭缺就在我家老屋的后面，是我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记得那时候，路的两旁有很多坟墓，尤数曹、王两姓的坟墓最大，路边的这座坟墓，当时也算大坟了，梅园石的墓碑，刻着“光绪庚辰年（1880）季秋月毅旦，清友衡王公墓，同配叶氏孺人”。碑两边还有一联：“相水迎环留远脉，鸡山坐拥护佳城。”去年，妻告诉我，这座即将坍塌的坟墓，是她爷爷的爷爷。这就对了，鸡鸣岭的南麓，原本有里王家、曹家两个古村，光绪《慈溪县志》称“曹王”村，其中不乏大户人家，后来毁于咸丰兵燹。这位王友衡先生，想来是经历了那场劫难的。于是，妻与她姐姐商量，一起出资修复了这座坟墓。

上世纪60年代的一场台风，将我家后园的围墙刮倒了。那天早晨，天特别凉爽，我一开家门，满园地的碎砖，墙外的世界如大幕一样拉开，岭缺下来的古道、“湖塘下老街”的废墟，仿佛都搬到了眼前。那时候，湖塘下老街废墟我们称作火烧场，与火烧场一样的还有里王家，到处是齐腰高的断垣残壁，农民们在废墟中种一些南瓜之类的庄稼。我挖过断墙的石头，用来垒门口园地的矮墙。记得靠岭脚还有一块光秃秃的岩坡，我们费了好大劲才能爬上去，然后再充当滑梯滑下来，乐此不疲。这块岩坡现在还在，也就一人多高，可那个时候，它是那么高不可攀。

鸡鸣岭两边的野果，给了我童年很多乐趣。“刺笼棚”，“佳佳梅”，“果果红”，“乌里蔓”，还有“茅针”、“刺脑”、“松毛伙”，甜甜的，酸酸的，味道真是好极了。那天，女儿买来一箱蓝莓，才吃了一颗，味觉立即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这不是“乌里蔓”么？一种久违的、亲切的味道，瞬间弥漫开来。也曾记得，一个孩子眼里的小个子老人，人们叫他“酱油老陈”，挑着两只酒罇，常常一拐一拐地从岭缺走过。小孩子会跟在他的屁股后走一段路，听他奇怪的腔调。听大人们说，酱油老陈是福建人，原来在这边当兵，抗战胜利后就留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他忠厚老实，住在山里的唐家庙里，开着一间小店维持生计。

谢家岭古道到张家湾口的拐弯处，原本有一个高坎，往坎上走就是张家湾，我家在那里有菜地。记得小时候我挑着便桶担去浇菜，上坎时，因为个子矮，便桶底碰到边上的石头，一担粪便全倒在了路上。从坎下走还是谢家岭古道，沿途经鹿山、施吞，翻越大岭后，向西南经上王可抵石步，向东北与九曲岭相接，经唐家、李家、张方翻越倒爬岭进五磊山，过了五磊寺东北的百步峻，再走黄泥岭（包括从相吞进山的黄婆岭，倒爬岭、黄泥岭都是九曲岭古道的其中一段）就能到鸣鹤古镇了。九曲岭是旧时横跨翠屏山脉的十八条古道之一。

趁着好天气，我与几位儿时的好友进山了。从下虎庙、中虎庙、上虎庙一路走去，在桂夹吞的村后上山，过“耙艇”到李家，大概是天热，路边不仅梅花正艳，向阳处的映山红竟也开了。

回头还说张家湾。张家湾是一个古村，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就不得而知了。记忆中的张家湾是冷冷清清的，只有种田、割稻时节，山里人搭的大草舍才会热闹起来。大草舍背后的山坡，俗称“八档隍”。八档隍其实是从鸡鸣岭往下看的八层梯地，其中有一层梯地是我家的，每年种一些番薯、马铃薯和豇豆之类，我常常一个人挎着篮子，冒着正午的烈日摘豇豆，回家后倒在箩头盖上晒。如今，岭缺、张家湾消失了；鸡鸣岭也因为采石，只剩下西麓靠近官桥那边短短的一截。曾经的岁月、人事，如风一般刮走了。那些有着风风雨雨、点点滴滴的故地、故事，包括我童年的欢笑，却还在我的脑海深处储存着。

老井

崔纪大

我们村子里有好几口井，过去村民们吃水都是到离家最近的井里去挑。挑水是男人的分内事，妇女们则到井头洗菜洗衣服，一边洗一边说说道道家长里短，所以井头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许多消息就是从那里传播开来的。

旧时农村，好像什么都有神，养蚕有蚕花姑娘，养牛有牛栏菩萨，井里有井花娘子等等，关于井花娘子还有一个凄美的故事，相传从前有一户人家，生活还算富裕，夫妻俩结婚十年才生得一个儿子，儿子满周岁时，父母就迫不及待地领来一个童养媳，名叫阿珍。那年阿珍十二岁，聪明美丽乐于助人，村民们都非常喜欢她。有一天，阿珍带着这个未来的丈夫在井边洗衣服，小男孩儿玩耍时不小心掉到井里去了，阿珍见状大惊失色，奋不顾身跳下井去施救，无奈人小力薄，等其他村民闻讯赶来时，阿珍已经死了，只见她站在井底，两只手死死地攀着井壁石头，井水很深，漫过了她的头顶，男孩骑在她的脖子上没有死，只是哇哇哇哭个不停……后来人们怀念阿珍，称其为井花娘子。

我小时候，常常跟父亲去井里挑水，跟着姐姐到井边洗菜。记得一个下雨天，因为不能到外面去玩，我就坐在屋檐下听姐姐讲故事，姐姐一边飞针走线做棉鞋，一边绘声绘色地讲田螺姑娘、九斤姑娘、最后还讲了井花娘子。我好奇地听得入神，最后她说，我做个谜壳，你猜谜肉是什么。谜壳就是谜面，谜肉就是谜底。我说好的，她便抑扬顿挫地念叨起来：一只圆桶在地下，日月星云在桶底，不信你去看一看，里面还有我和你。我想了老半天，还是没想出来。下午雨停了，天放晴了，姐姐到地里割来一篮菜，叫我拿着吊水桶一同到井边去洗菜。她站在井台上对我说，现在再做一只谜壳让你猜：一只无盖有底桶，一根横梁在当中，长长尾巴通天空，手上松一松，下面“扑隆通”。我当时手里正拎着吊水桶，一手捏住绳头另一手把空桶扔向井底，扑通一声，我脑子也立马开窍了，谜底就是吊水桶啊。姐姐哈哈大笑，走过来和我一起往井底看，清澈的井水倒映着蓝天白云大太阳，还有我们两

乡村老灶的记忆

周建强

偶然回乡，在邻居家看到了久违的乡村老灶，感到格外亲近。只见主人一家子围在老灶边，女的准备午餐、打毛衣，男的喝着茶聊天，其乐融融。灶膛映出的熊熊烈火，勾起了我对老灶的无限怀念和感慨：记忆中老灶是冬日里温暖的源泉，更是孩提时的乐园。

在宁波近郊农村老灶的建筑布局大同小异：大都建在靠房子的北侧或西面，用石板、条石、砖块砌成有一定坡度的灶膛，烧火处口子小且稍高，里面的灶膛低而平且空间较大。灶台上的两口铁锅，分别用来煮饭和烧菜，两口锅的中间还置有一个用铜、铝或是陶制的汤锅（罐），它是利用烧饭时的余热煮水的，饭菜飘香时这锅水也成了热水，成了我们洗脸洗脚时随用随取的“现成品”，而用大铁锅、柴禾烧出来的米饭、锅巴已成了美好的念想，好久未曾吃到了。

老灶旁还置有一个方形或者半圆形的灰间，用来放置灰烬，草木灰是乡村一种上好的农家肥。人们可以在灰间利用刚烧过的灰为家人制作第二天的早餐，制作的方法也很简单：把一个盛有食物和水的瓦罐密封放置在灰间正中，然后用稻草结成一个结实的厚草圈套在瓦罐上，用铁铲铲出还冒着火星的灰，均匀地铺在草圈边上，上

个人的影子。我高兴地叫了起来，原来上午那个谜壳的谜肉就是这口井啊。

有一年，村里发生火灾，把井边的两幢老屋烧成了废墟，着火时许多砖头瓦片焦木炭等掉落到井里，污染了水质。乡亲们要喝水，必须把这些东西及时清理掉。当时有个青年先下去，不多一会儿就大叫“难受”，于是上来了。这时，一个叫品法和尚的壮汉自告奋勇地说，我下去试试。品法其实不是出家人，因为他四十多岁还未讨到老婆，所以村民们给他取了这么个绰号。品法和尚下井没多久时间就靠着井壁不会动了，等到井上的人叫来几个身强力壮的村民下井去救他时，他已经死了，当时大家感到非常奇怪，有人说可能是井花娘子看上他，把他叫走了。几年以后，我在中学课本里读到化学时，联想起这件事情，觉得品法和尚可能死于一氧化碳中毒。

大概是十五岁开始吧，挑水这项繁重的家务活落到了我的肩头，第一次趑趄起地把两桶水挑回家，我摸着红肿的肩胛深刻地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那根宽宽的竹扁担压着我走过青春时代，那爬满青苔的井壁、被吊水绳磨得光洁滑溜的井沿是我熟悉的景物。

现在井头已经很冷了，只有住在边上的几户人家还在那里汲水洗衣，也许再过几年，“长长尾巴通天空”的吊水桶会被当文物看待了。



面再盖一层灰。第二天一锅香喷喷的大米粥或是黄豆汤便熟了。

寒风呼啸、雪花飘飘的冬日，灶间是人气最旺的地方。在食物缺少的年代，烤芋艿、烤大头菜、煨番薯、煨年糕是我们百吃不厌的“零食”，所以每到冬天，我们是抢着烧火，一边烧火，一边煨食物，一边烤火烘干在雨雪天踩湿的鞋袜，真可谓是一举三得……当时的燃料有稻草、棉花秆、菜籽秆，旧木头和毛竹，但还是不够烧，父亲只好与村里壮劳力一起步行十多公里将从四明山上砍来的柴挑回来晒干充作燃料，但我最喜欢的却是烧麦秆，不仅火旺，而且还会发出噼里啪啦类似爆竹的声音，让人兴奋，灶膛的火苗瞬间映红了稚嫩的脸膛。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新建的样式新颖别墅般的楼房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农村老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煤气灶、电磁灶、电饭锅，而为数不多的老灶也“退居二线”了。时至今日，乡村的老灶已变成一种我们对以往生活方式的回忆了。每当有机会重新坐在灶间，拨弄着柴禾时，仿佛又回到了与老灶一起度过的那些快乐无忧的童年时光。



余秋雨：记忆文学

71

“说！”我命令杨长勋。

“第三种可能，她就是那个妓女。”杨长勋说，“这种可能最大。”

我回想她低头低声、快速离去的样子，又把妓女说成是“特殊的女性”，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就说：“那她就很高尚，我们谁也不认识她，她也不必道歉，但她却道歉了！齐华，你说呢？”

我转身看齐华，发现他还发傻一样看着图书馆的大门。“太像了。”他喃喃地说。

我看着他，立即明白了。刚才我看这个女青年的时候真还觉得几分眼熟呢，不错，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姜纱，只是小了一代。“像谁？”杨长勋问我。

“一时说不明白。”我说，“以后慢慢再给你说吧。”

这时我发现，齐华整个人全变了。我拍着他的肩说：“别忘了，明天下午，还在这里！”齐华点点头，没有吭声。

那天晚上我为了那份给读者的声明，想了很久。中国民众对谣言，从一开始就半信半疑，因此谣言在伪造出来的第一天就已经赢了一半。当这个谣言一度重复，一半就

变成了全部，当事人自己声明“这不是真的”，没人相信。想到半夜，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针对读者最弄不清的“文革”和“石一歌”的问题，发表一个可以执行的“悬赏”——

一、任何人只要出示我用“石一歌”名义写过的任何一篇、一章、一节、一段、一行、一句有他们指控内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为酬劳；

二、一千多篇诽谤文章的任何一位作者，如果在“文革”期间已经成人，现在又能证明他在那时也像我一样完全没有参与过造反、夺权，完全没有参与过揭发、斗争，完全没有参与过“革命大批判”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完全没有歌颂过“文革”和样板戏，我立即支付自己两年的薪金，作为奖赏。

第二天下午，我按照昨天的约定，又来到那个房间，把这份“悬赏”稿给齐华和杨长勋看了。他们都用悬赏的办法很好，能够最雄辩地说明事实真相。但是，他们又觉得第二个“悬赏”把握不大，不容易执行。“如果真有五个人在‘文革’中什么也没有做过，来领赏，你就要拿出十年的薪金，那可是很大一笔钱啊。”杨长勋说。

“放心，我调查过，文化界里边，在‘文革’中像我这样干净的，至少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有，也绝不会写诽谤文章。”我说。

但是，他们仍然认为，有机会，发表第一个“悬赏”就够了。杨长勋说，现在读者都被那些人搅糊涂了，他要

写一本书，说清来龙去脉。

这天下午，齐华心神不定，一直抬头看窗外。窗外的雨还在下，但没有昨天大。一顶顶不同色彩的伞，在窗口晃过。齐华只要看到比较鲜艳的伞，总会伸长脖子看一看伞下的人。但是，那个“姜纱”今天没有来。

我和马兰商量，决定离开上海，在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比起上海，当时合肥还相当贫困落后。城市建设完全不像一个省会，街道上拥挤着一排排酒、烟、药的广告，密不透风。我们住在三里街一处简陋的宿舍里，我在那里写了《霜冷长河》和《秋千架》。中国科技大学的朱清时校长听说我定居合肥了，就聘请我担任他们学校人文学科的兼职教授。我想，这也是我在合肥的一个不错工作，就答应了，而且已经开始认真地讲课。

在合肥几年，我心里很安静。妻子经常要带着剧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场。当时国内有几家报刊在全国各省做问卷调查，问广大民众最喜欢哪个剧种，最喜欢哪个演员，她领军的剧种和她本人，几次都名列第一。她不管到哪个城市演出，都一票难求。即使在台湾大选期间，剧场外面每天晚上拥挤着几十万为选举“造势”的民众，没有一个剧团敢于在这种时候卖票，而她的演出还是场场爆满。在大陆很多城市，她都创造了连续演出场次最高的纪录。戏剧危机，在她身上从未体现。

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